



中国管理哲学序论 (2005-6-28 10:27:17)

作者：葛荣晋

三、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有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

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，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所构成。

从理论层面看，主要有四点：（一）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。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西汉刘歆在《七略·诸子略》中提出的“九流十家”之说。“九流”是指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农家和杂家。“九流”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，称之为“十家”。从管理哲学上讲，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，即以老、庄为代表的道家，以孔、孟为代表的儒家，以孙武、孙臆为代表的兵家，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。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，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的道理。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，在他们的“文集”中也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之道，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。（二）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、奏议、书信、杂说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。日本企业家如铃木博、村山浮等人，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。如韩愈在《杂说》中所云：“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”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，要求管理者要具备“识贤”的能力，方可发现“千里马”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，认为秦王“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，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”是秦亡的根本原因。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“一言堂”还是“群言堂”的作风问题。凡是管理者采用“一言堂”，不但使管理者“日益骄固”，而且也“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”，总有一天是会垮台的。宋代诗人苏东坡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亦指出：“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。”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。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，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，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，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。要想得到“匹夫匹妇之心”，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造企业家的人格魅力。明代洪应明撰写的《菜根谈》一书，也被日本企业家加以现代诠释，奉为企业管理的座右铭。

（三）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。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，历代兵书极为丰富。以先秦为例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所载兵书就有53家，790篇，图43卷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吴起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司马法》等。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，但也有相通之处，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。所以，可以把兵书中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。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商贾经营的是战国“善为商贾”的洛阳人白圭。他不但乐观时变，善于掌握气象规律。把握经营时机，在丰年时大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，从中获取成倍利润。在经营策略上，采取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的原则。在人格上，根据《孙子兵法》的人格论，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必须具备“智”（机敏灵活、善于应变）、“勇”（判断果决）、“仁”（取予适时，不一味与人争利）、“强”（意志坚定）四种人格要素。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，实践证明是成功的。所以，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，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。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日本企业家将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十六计》等兵书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，形成了兵法管理学派。（四）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管理思想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等。现代企业家也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、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，也为现代企业家所乐道。如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相后，他想要稳定军心、民心，重振蜀国，不但要有治国方略，还要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。蒋琬执政后，许多老臣不服气。东曹掾杨戏同蒋琬议事，傲慢无礼，或沉默寡言，或说话不中听。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，中伤杨戏。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，于国不利。于是，他为杨戏辩解说：“人哪有一样的啊！杨戏只是说话比较慎重，再说他想赞同我，违背己意；想反对我，倒显出我有错，还不如干脆不说好。以后你们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。”而姜维则没有蒋琬那样的宽容气度，当杨戏借酒冷嘲热讽他时，就找个借口把杨戏贬为平民。督农杨敏议论说：“蒋琬做事昏庸，比不上前任（指诸葛亮）。”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，主张责问杨敏。他非但不怒，反而说：“我确实不如前任，心里时常愧疚。”“既然不如前任，行事自然处置不当，这不就是昏庸吗！还责问什么？”后来

杨敏因罪入狱，蒋琬并未借机报复，反而秉公处置，未判杨敏重罪。从蒋琬的宽容处事中，要求企业家必须在处事待人上，要具备容人、容言、容事的宽大气质。只有对下属宽容大度，能忍则忍，能让则让，以德报怨，化敌为友，多看人的优点，少责人的缺点，是营造企业向心效应的有效手段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。《红楼梦》第56回《敏探春兴利除宿弊》，描写的是贾探春如何改革与管理大观园的故事。贾探春按照墨家的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的管理原则，以“兴利节用为纲”，“使之以权、动之以利”，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。这一大观园改革的新经济政策出台后，纷纷要求承包。他们把自己所承包的视为“永远基业”，每日早起晚睡，自己辛苦劳动和照看，生恐有人遭踏。他们“照顾得谨谨慎慎，一根草也不许动。”同时，按照薛宝钗的“小惠全大体”的管理思想，还对未承包者施以小利，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。这是成功管理的典型。

从实践层面看，主要包括三方面：（一）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。从明中叶以降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市民阶层的形成，不少士人的价值观念有所转变，把“儒”与“商”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儒商及其帮派，其中最著名的有徽商、晋商、宁坡帮、潮汕帮等。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位杰出代表。在他们的商贾经营中，能够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，并在实践中积累了管理思想。此外，还有明清以来的老字号店的经营之道，比如北京的同仁堂、全聚德、六必居等。他们所以能够长久不衰，必有其成功的秘诀，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。（二）近百年来，海内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。他们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，总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工商业结合起来，提出过各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。这也是一份重要的文化管理资源。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：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祖陈启源，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焜，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，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。在香港，有董建华、李嘉诚、霍英东、曾宪梓、汤恩佳、梁凤仪、邵逸夫、金庸、荣智健、杨钊、蒋震等人；在澳门，有爱国报国的马万祺；在台湾，有博士商人朱伯舜，台塑巨人王永庆等人。在美国有华人电脑专家王安，华裔女杰陈香梅等。在新加坡，有亦儒亦商的民间大使唐裕，有热衷于文教的橡胶大王李光前，亦文亦商的周颖南等。在菲律宾，有南洋儒商林健民，菲航总裁陈永栽，亦商亦学邵建寅，以诚取胜吴彦进，学者经商云鹤。在泰国，有梦莉、胡玉麟等人。在马来西亚，有马华文坛帅才云里风等人。（三）从1949年以来，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，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管理资源。这里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从正负两方面，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。

由此可见，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构成的中国管理思想是极为丰富的。对于这些管理文化资源，必须站在现代企业管理的高度，对它进行现代转换，注入时代精神，进行新的诠释，方可成为建构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的有用资源。在这一方面，日本、韩国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海外华人企业家比中国大陆走在前面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[\[第 1 页\]](#) [\[第 2 页\]](#) 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